

安澤紀事

(石函藏稿)

遂鼎藝

前 言

《安泽县志》出版发行了。然而根据“四项基本原则”，不少资料被刷下来。如果系琐事末节也就罢了，可有些事件割舍不下。我总觉着有责任将历史真相告知后人。因之写了这几则纪事。自然多属“敏感”性问题，怕永无面世机会。我且作一回东施“效颦”先贤黄遵宪，藏稿于“石函”。我的习作自然没资格与黄老的《忠臣藏》相比，顶多可充作土特产，登不上大雅堂。我是一个长期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小职员，无缘结识专家学者，只有几个交情不错的学友，分送给他们评品指教。如果有幸被学友看上眼，介绍给历史学家作参考，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过：中国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而“历史知识”的根底在“历史材料”。材料累积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进。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可见记录历史材料，是很有意义的。

十二月事变在安泽

“十二月事变”是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山西的一桩历史大事件。共产党称之为“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最突出的表现为“旧军打新军”。

这里所谓的“新军”，即是两年前阎锡山邀请共产党人协助组建，并进行训练的抗日决死队。到1939年秋抗日决死队已发展为四个纵队，又四个独立旅，计42个团，成员约60000人。这样一支新生的、庞大的、训练有素的新军，在共产党人的策动下，有相当一大部分要脱离阎锡山军建制，投奔加入八路军。

阎锡山自然不能容忍自己出钱、出人、出装备组建起来的部队叛离他而去。早在当年春季在陕西省一个名秋林的小镇军政高干集训会上，阎锡山就一再提到要“精诚团结，合力抗战”，尤其对决死队四个纵队的领导人薄一波、韩钧、董天知、戎子和等人做了大量的说服劝导。但是，在共产党人看来阎锡山的抗日是不可靠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中坚力量。决死队叛阎投共的事儿，据一些史料记载：“事变”是从驻乡宁、河津一方韩钧、张文昂领导的决死二纵队首发起义的，因之亦称“晋西事变”，时间是1939年12月3日。这是可信的，我的一个本家叔父逯清洋（汾西僧念村）和一个表兄薛峻源（汾西薛家庄）都在

二纵队当兵，他们二人都是共产党员，亲历了事变的全过程。据他俩讲，他们从乡宁举事，经汾城、襄陵、临汾、洪洞、赵城、汾西、孝义诸县向北进发，阎锡山派陈长捷61军追、围、堵、截他们。因他们是巧取日军与阎军间空隙穿插急进，阎军怕冒犯日军，不敢有太大动作，双方接火并不多。倒是受阎顽派拉拢，不时有人逃跑离队，为此他们也处决了一些所谓的“内奸”。到中阳县边界，有八路军接应，阎军也停止追击，他们也就正式加入八路军建制。

当时的安泽县境内既没有成建制的决死队，也没有正规的阎锡山军队，所谓的“旧军打新军”连影子也没处找。但是，在中共太岳特委的领导下，安泽县的共产党人凭借手中的实力，主动出击，大打出手，杀了很多所谓的“顽固分子”。

太岳地区当时是安子文主党，薄一波主政，薄同时也主军，他是决死一纵队的政治委员。沁县、沁源、安泽、屯留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薄一波的手里。

安子文、薄一波都是共产党的谋士，更可谓是斗士。他们二人似乎早就看出国共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与阎锡山斗争是先下手有利。早在当年11月中旬，太岳区特委已部署行动。18日夜晚，特委就在安泽县双头村贴近沁源边的后河庄，召开安泽、洪洞、赵城、浮山四个县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人员系各县县委委员及部分区主委，内容是由太岳特委组织部部长王一新传达特委的“指示”。他先借用阎锡山在秋林高干会上讲的两句话“大雨将

降，准备雨伞”为导语，说明阎锡山要发动反共逆举，告诫全党要做好应付残酷斗争的准备。为立于不败之地，务必“抓紧时机，主动出击，消灭隐患，务求必胜！”

与其他三个县比较，安泽紧靠太岳腹地，有决死一纵队做后盾，一支以决死队改名的八路军特务二团已活动于罗云、和川、唐城一方；安泽县政府还有一支实力很强的公安部队。临屯路以北地区没有蒋阎驻兵，县政权都在共产党员手里，阎锡山的影响力也十分薄弱，因之获胜的把握极大。

活动分子会后的第三天，县长张学纯就宣布政府机关所有人员，一律拿起武器，与张仲林的游击队合编为安泽县独立营，他任独立营长，张仲林任副营长。同时还聘请特务二团李日曾、程强戎等5人训练独立营兵士，从公安局借来所有库存枪支，提高其战斗力。

县委则根据上级“隐蔽下来，坚持斗争”的策略，派出王茂新、柴占厚、李安、郭树塘四人为联络员，分赴全县向19个编村的党支部成员传达县委的指示：绝对隐蔽，暂停活动，抓紧武装，铲除隐患；可能暴露的党员立即撤退至路北来。兰村、孔村、西上寨就有8名党员撤至路北的小黄、石渠和荆村。石槽、马壁等村有中央军166师驻防，又有阎锡山197旅政工人员渗入，未来得及转移。在随后不久，石槽村有两名党员在敌人利诱下叛党，党组织暴露，支部书记张立业潜逃，有三名党员被阎锡山部扣押。

这是全县唯一受到损失的一个党支部。不过由于营救及时，中央军166师中的中共党员向阎锡山部施加了压力，被抓的三名党员很快获释放。

阎锡山的政治头脑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共产党员薄一波委任的安泽县长和区长不会是他的人。据传他曾说过“沁源、安泽非吾所有”的话。但是他还是不间断地派出巡视团、突击队、精建会等到安泽来，宣传他的“精诚团结、守土抗战”主张，考察（监视）安泽县政府的施政效果。他甚至还存有一丝幻想：认为安泽政权属他第二战区统领，军政人员逐月向他领取经费与薪金；如果多施劝导与拉拢，或许可以缓慢其“左倾”的时间，不致骤然倒向共产党一边。巡视团、突击队来“检查”工作三两日即离去，而以黄、苏两委员领衔的精神建设委员会一行7人，自12月中旬来到罗云村后，一直守在政府身边。因为国民政府于当年3月明令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与《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并声称这是“第二期抗战制胜之主要条件”。阎锡山借此大搞“精神总动员”，派人到各县宣讲他的《抗敌行政十大纲领》《抗战人员必戒》和《抗战必要条件》等，以增强全体抗日军政民的抗敌精神力量。按说这也是正常的“例行公务”，对当时的抗日县政府工作及政治动向，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却引起共产党安泽县委（时称八路军工作团）的极大反感，甚至认为他们是替阎锡山做“特务工作”。

古人云：成大事者“务在知时”，知时即知机遇。中共中央

头几个月就提出要“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如今通过工作，山西有几十个团的“新军”要背叛阎锡山，投奔八路军，这不正是打垮阎锡山势力的最佳机遇么！

共产党奉行的是斗争路线，斗得狠，斗得彻底，斗得残酷。

在安泽的反阎斗争，只有斗，没有争，因为驻防安泽县境南部中央军的166师，不参与阎锡山与共产党的磨擦，甚至不允许阎锡山的晋军进入防区。岳北只有共产党一家的武装力量，为所欲为，得心应手。

安泽县的反阎斗争开始于“除隐患”，时间在12月中下旬之间，被处决的有小黄村的马海狗、石渠村的常中厚、桃寨村的王学保、罗云村的朱定则、上田村的李善禄、安上村的杨兆庆、议亭村的陈振海、唐城村的张文铨、和川村的李湘洲、孔旺村的翟来宝、白素村的孟庆和、石壁村的张庆济、岭南村的常文明等。这些人有的是国民党员，有的在抗战前任过编村干部，有的是地主分子。其中旧编村村长陈振海、地主分子张庆济是由于有人告状由决死队成员大白天拉到村外枪决的。其余则多是深更半夜被人绑架，头蒙麻包，拉到村外阴暗角落，或刀捅、或斧砍，为灭迹绝痕，尸体有的被抛入沁河深渊，有的被投入荒野枯井。唯一通过“法律”手续处决的只有岭南常文明一人。常是地主分子，又是阎锡山命官，是安泽县主张公道团团团长。当年4月牺盟会公道团合并称牺公联委会，常任副主任委员。在东洪驿村召开公判

大会，由县政府武装科指导员吉佩芝(河北定县人)起诉，共产党员王学民(岭南村)、朱玉海(荆村)作证，确认常文明系阎锡山派来的特务，做了很多坏事。最后由县长张学纯当众宣判，枪决于村外沁河滩。时间是12月28日。

最大的一宗杀人案发生在三天前的25日深夜。当时有一支名曰“民大五分校”的政治宣传队，约40余人，由长治至屯留，由屯留至沁源，再至安泽罗云村，主要是宣讲阎锡山“守土抗战”一套。因晋西事变发生多日，政治气氛已十分紧张，他们在罗云并没设讲坛，而只是欲取道安泽回晋西去。当他们离开罗云村行至和川村东洪驿坪时，突然被尾追的“八路军特务二团”团团围住，收缴了他们所带的长短枪支，押解至和川村，分别关进三座深宅大院内，开始吊打、火烫、钳拧刑讯逼供，非要他们承认是“刺探军情，破坏抗日”。午夜凌晨时分，拖拉押解过沁河，避开大路翻岭到了一个名杏坡的小庄。这个小庄仅两户人家，处于一个簸箕形的山洼洼，隔沁河四五里外才有村庄，是秘密杀人的绝好场地。为了不出声响，40多名民大学员全都用大刀砍头丧命的。这支假名“八路军特务二团”的行刑队，实际是驻沁源县决死一纵队的一个连，连长名吴有福，是事变前薄一波从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要来的红军战士，四川省人。1979年10月我在成都红军疗养院拜访过吴老，是为了解别的事儿，不意他脱口先提及“杏坡”处决阎锡山特务分子一案。他告诉我说：“晋西事变”后阎锡山怕招惹八路军参与进来，提的口号是“只打叛逃兵(决死队)，不惹八

路军”。因此，他领导的那支执行特别使命的决死队才挂了“八路军特务二团”的番号。这一“包装”不仅自己可以出手打人，还避免了别人来打。他还十分自得地告诉我：那天黑夜他亲自用大刀砍死9个“阎锡山特务”；因大刀后来变钝，第9颗人头怎么也砍不下来，他才命令手下人用刺刀结果了未死者的性命。他还额外加了一句：第二天他狠狠训斥了通讯员，怨他没能磨快大刀。同宿舍另一位老红军戏称他是“刽子手”，他坦然地回敬说：“革命就得杀人，不杀人革的啥子命哟！”老四川口音很是浓，这大约能代表一部分共产党人对革命的认识。

1939年12月31日，是安泽县历史上最阴森、最恐怖的一天。这一天下午，在罗云村外牛栏子沟的一孔土窑洞里，安泽县党政军警要员：八路军工作团团长兼县委书记韩柏、组织部长王云、宣传部长李时伟、县长张学纯、县府秘书郭板图、公安局长王正中、指导员袁平、武装科长孙维吉、独立营副营长孙中林等密谋策划，决定当夜采取“非常行动”，要求“不择手段，除恶务尽，彻底消灭安泽境内蒋阎顽固分子！”

当夜兵分四路，全线出击。

武装科长孙维吉任务小，仅带手下12名武装人员，疾行30华里到和川南的荆村，这里有中央军166师办的一个军用合作社，出售食盐布匹等日用品，换购粮食南运供军需。孙维吉等仅用二、三十分钟，即处死经理刘敬中、会计于得福、营业员黎某，货物

洗劫一空，连夜如数运回罗云村。

第二路的任务也是小菜一碟儿，由公安局指导员袁平带10名武装，直奔30华里外的唐城牧羊场。这是民国七年阎锡山创办的专事繁殖细毛羊的事业机构，场长及管理人员均是战前由省城委派下来的。这些人不问政治，专事业务，与外界很少交往。场长段国桢（赵城县人）、管理员杨兆中（洪洞县人）、技术员宋荣生（霍县人）都是从个人宿舍拉到野外用刺刀捅死的。此间要特地提一句的是唐城二高校长任庭栋（亢驿村人）系国民党员，“事变”风声紧的日子里惴惴不安，是夜躲进牧羊场借宿。不意正碰在刀口上，照袁平跟我谈的是“顺手牵羊的结果了任庭栋”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第三路就在县府驻地罗云本村，前台指挥者是独立营副营长张中林，政府秘书郭板图，幕后实际操纵者是组织部长王云和县长张学纯。他们的任务是解决身边的精神建设委员会。几天前精建会黄委员等曾向张学纯县长表示要辞行，而张县长为了“拖”住他们，谎称安泽抗日县政府正起草一份工作报告给战区司令官，要黄委员等候一两日，也好回去复命。其实，当时他们已被完全暗中监控，想走也走不了。待到31日子夜，他们已大难临头。张中林率领20名武装骨干，冲入毋家大院，将精建会7人，个个双手背绑，面蒙黑布，押到罗云村背后的深沟，推入早已挖成的7个深坑，活生生埋于地下。罗云村1939年入党的毋秀明、徐金中二人，46年后告知我：挖坑的时候他们二人都参与了，而活埋人

的时候他们都不在场。大约这也是精心安排的一着。

任务最为重大的一路有30名武装干警和12名从沁源县来的决死队员，由县委书记韩柏(焦善民)，公安局长王正中率领，奔袭80华里外的高城村的核桃庄。这个偏僻的山庄距日军城关，旧县两据点均为30华里，是国民党33军团特意设立的一个谍报站，从灵石经霍县至安泽，专事负责跟踪搜集日本驻军的动态情报，是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的耳目之一，其收报发报设备在当时堪称一流，12名谍报成员多有短枪护身。但是这一夜天刮大风，还下小雪，两个哨兵都专注于正西城关与正南旧县的日军方向，不意从东北方后背来了一大股人，将两个哨兵与窑洞内正在熟睡的10名人员，全部拉到野外的雪地里，用刺刀捅死。3支长枪，7支手枪归作战人员，指挥员韩柏、王正中自然有份。文件与电台派专人上交中共太岳区特委。从此太岳特委与延安中共中央及外部联络有了电台。安子文书记夸奖韩柏说：“你可为党立了大功！”

令人惊异的是共产党是从什么时候，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注目于国民党军这个十分机密又事关抗日大局的谍报站的，这才是要害之所在。

在此期间，阎锡山在安泽也有过“反共”的挑衅行为。

其一是先头已提到的，阎锡山197旅政工人员渗入进石槽村，诱惑何、杨两人叛党，破坏了石槽村党支部，书记张立业脱逃，郭长福、郭生才、候振被抓捕。但是在中央军166师的压力下(不许

阎部在该防区随意捕抓人), 阎方政工人员既没动枪, 也没敢使棍动刑, 只是对郭长福等“训导”两日, 写了字据, 在有人具保的情况下便释放了。

其二, 阎锡山197旅9团王寿堂部进抵杜村、河阳一带, 孙楚委派的吴清海一伙“收拾安泽残局”的政工人员也跟了进来。他们认定岳北安泽县政府委派的兰村、杜村、英寨三个编村村长是共党员, 派遣人抓捕。兰村编村村长王志学闻风声跑到岳北, 杜村村长候其昌, 英寨村长史文保, 还有三区副区长高天祥被抓到河阳村。审问候、史、高三人的是9团政治主任吴清海。吴是以查获由岳北转来的一张纸条提问的。这张纸条是候其昌好友张效亭手书, 内容是要候“注意安全, 说家里人想他”, 末尾具了一个“张”字。吴清海认为是共产党县长张学纯的暗示来函。他开口即问候其昌“张学纯给了你什么指示?” 候回话说: “什么指示也没有。”吴拿出“证据”让候看, 说“这不是张学纯写得么?” 候一眼就认出是张效亭的笔体, 胆子更壮了, 他斩钉截铁地回话说: “这根本不是张县长写的, 这是有人要陷害我!” 吴又问候是不是共产党员, 候干脆回答说“不是!” 在场的国民党安泽县党部书记长贺庆云插话问: “不是共产党, 前几日为什么到罗云去?” 候其昌反唇回敬: “你是国民党党部的书记长, 不是也去过罗云吗?” 吴、贺两人再也找不出什么岔子要挟。至于高天祥, 比候其昌、史文保态度要硬得多。他质问吴清海、贺庆云: “你们怎么敢随意抓捕政府工作职员, 这是不是破坏抗日?!” 并声

言要将这种违法行为报告薄一波专员。

贺庆云装作事不关己，转身离开。

吴清海口口声声承认是“误会”。

随后杜村、英寨两编村各派来几位间长保他们的村长回去，说有紧急公务待处理。吴清海笑着回话说：“既有公务要办，就领你们的村长先回去吧，以后有事再传他们来。”并转脸对高天祥说：“高区长，您也请便吧！”

候其昌、史文保、高天祥先到了杜村，再到了英寨，第三天即越过临屯路回到岳北罗云村。据候其昌回忆说：他们从杜村到英寨有人监视，从英寨动身设法甩掉“尾巴”，再没遇到什么麻烦。

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12月30日，日前阎锡山一支番号为黎明支队的武装30余人，在罗云村住了四日，妄图滋事，安泽县独立营用断粮断水的办法“轰”走他们，他们于30日午后窜至唐城镇，入夜后袭击四区区公所，将区长刘敬塘及其5名工作人员绑架，连夜逃跑到临屯路南的英寨村。这支武装的头头名李葆全，另一个名李汉杰。他们说共产党在唐城杀了几名二战区工作人员，是刘敬塘等告的密。刘敬塘区长要证据，他们拿不出来。刘敬塘质问他们无故绑架抗日区公所成员，是不是有意破坏抗日？二李无言以对，更显窘态。在张学纯县长抗议(差人送信)下，1940年元月3日黎明支队先释放了黄维翰、阴吉庆、张继伟、牛肖仪、

徐振福5人回了岳北。刘敬塘多扣留几日，二李将他待为上宾，好生相待，好言相诱，问他知不知道一个名马己恭的人(据传是阎锡山委派到沁源接任县长的，在安泽唐城一带失踪)，刘敬塘断然回话说他压根儿就没听说马己恭其人，更不知他的下落。二李无奈，亦于6日放刘敬塘回到罗云村。

以上三例，证明阎锡山顽固派在安泽确有反共行为，亦确实违反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协定。但其处置方法是有所克制的，不算太越规。这与安泽境内某些共产党人的做法形成极大的反差。这不由使人想起毛泽东主席(不知何场合)说过的一段话：“国民党是执政党，在台上，他们所制定的法规他们自然得遵守……我们共产党是在野的，是受压制的，我们不能受他们的挟制，我们是无法无天的！”(大意如是)。

共产党组织当时还处于完全隐蔽状态，所做“反顽”行为自然也是十分保密的。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密”是保不住的。特别是当阎部黎明支队绑架了四区区长刘敬塘、武克孝(平遥人)出任四区区长一职。武区长上任办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铡刀铡了唐城村民李五则。罪名是阎军绑架刘等是他引的路。这件事儿在全县顿时传开，人们由窃窃私语变为公开评论，都称武克孝为“武阎王”，杀人不眨眼。这自然玷污了共产党的形象，不满半个月，武克孝撤职查办，调离安泽县。

听说中共霍县县委书记王大经、赵城县委书记郝可铭，也是因为杀人过多撤职调离开的。安泽县委书记韩柏、县长张学纯是

否也因同一理由离开的安泽不得而知，但时间也在1940年元月中旬。

其实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权宜之计，郝可铭、王大经先后于1940年2月、4月出任安泽县委书记。张学纯调沁源县任县长。韩柏则于1941年10月升任岳南地委书记。

由于安泽“反顽”彻底，阵地巩固，山西省第六行政区河东办事处由裴丽生主任率领，撤退至安泽县寺村；赵城、洪洞、临汾、浮山、襄陵等县党、政、军领导人及部属，也都在1940年1月中旬撤退至安泽境内立住脚，随后依托安泽复向外拓展地盘。

我有一个朋友名王生甫，是山西省文史馆馆员。他曾多次拜访过薄一波，写了不少有关牺牲救国同盟会与抗日救国决死队的著作。他曾请示过薄老：“晋西十二月事变”可不可以写？薄老告诉他：“还是不写为宜，因为中共中央对这次‘事变’一直未作过决议。”

为什么没作过决议？恐怕有些深层次的历史内涵与是非不易说得清楚。

抗日时期的反顽战役

共产党高层的文化人给阎锡山取了一个极别致极典雅的称号：“顽固头领”，既蔑视，更具讽刺与挖苦意味。如果在抗日战争中后期说阎锡山顽固、反动是情有可原的，因其确与日伪有过勾结事实；若在抗战之初即称其顽固，似乎有点欠公允。因为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阎锡山即聘请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人为座上客，协助他组建牺牲救国同盟会。“七七事变”刚一发生，阎锡山即电邀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至太原城，协商合作御敌共同抗日事宜，并请了一批红军官兵帮他训练与组建青年抗日救国决死队。随后又准许八路军三个师挺进山西，建立抗日基地。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共与阎反目为仇是从1939年12月开始的，当时新组建的抗日决死队有好几万人要投奔八路军，阎锡山自然要反对，于是出现了所谓“旧军打新军”的事件。从此阎锡山后退了，反共了，也真有些顽固了。再往后的1942年竟与日军暗中勾搭，但也并未公开投敌，变成第二个汪精卫，似乎也不应把他当做敌人，因为当时全中国军民公认之敌只有一个：那就是企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

关于八路军在安泽的抗日功绩，我在《安泽县志》以“府城狙击战”“圪瘩沟战斗”“将军沟战斗”“柳寨伏击战”诸节已

作了充分的肯定。当时的八路军还用兵于另一条战线，多次出兵反“顽”；而且就安泽一隅而言，八路军用于反阎锡山的兵力比用于抗日的兵力要大得多。从共产党长远的战略目标考虑，这也许是有理由的；但若用历史的尺度衡量，则党派的利益是不应该高过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的。

遗憾的是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政治家与历史学家的观点是难趋向一致的。这也难怪，说到底政治家是时代性的，而历史学家则属于历史本身。我是一个历史爱好者，此间记述的三则战事虽然不完全发生在安泽境内，然而其进击基地则完全依托安泽县而展开，这对多角度地了解当时的历史全貌可供参考。

晋家山攻击战

1940年夏，日军已占据安泽县城一年多，不断向东向北出击，并在霍山之颠的北平黄梁山设一据点。涧河以西没有八路军一兵设防。仅在安泽县西北一隅的热留凌云诸村（今属古县）有“十二月事变”后由洪洞赵城两县撤退下来的地方工作人员，其中成建制的有洪洞县景仙洲的游击队，约二百余人，称景支队。但因武器装备太差，极少与日军接战，只偶而到洪洞、赵城县的边沿村“游击”一下，收取点粮食给养之类。这样在安泽县涧河以西至洪赵两县的东山一带就出现了一片真空地区。当年五六月间，阎锡山部卫立功的教导师越过汾河，逐渐推进至洪洞与安泽县间的晋家山一带，据说是为遏制安泽县城的日军向外扩张。但此举也在一定程度上防碍了景支队的“游击”范围，尤其不利洪、赵两